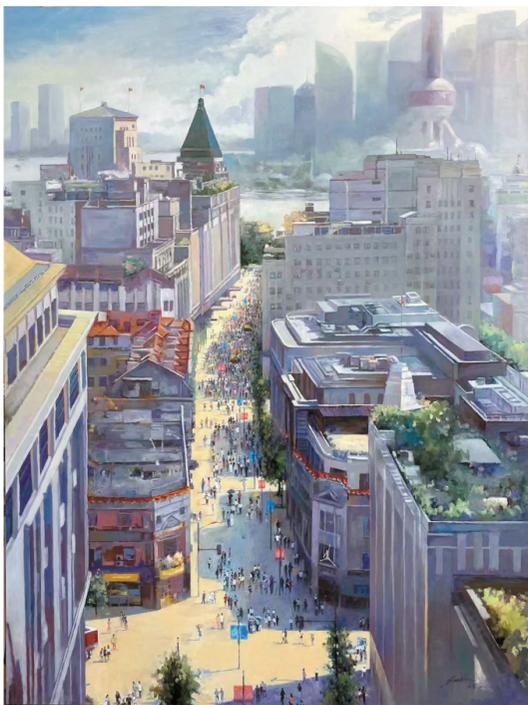


# 时间朝着某个方向飞

赵艳华

天地间



一路向东（油画）孙志奎

朝花

岁末，我突然怀念起10月，怀念10月里的浩荡阳光，夜晚的虫鸣，还有夜晚排队飞过群山上空的鸟儿。这些事物都在连州。

今年10月，作为支教老师，我有幸在广东北境的古城连州流连。在连州，我住15楼，阳台朝西。阳台正前方就是一块一块的稻田，稻田之后就是层层叠叠的青山。那是我从来没有拥有过的好视野，只要抬起眼，随时就能看到又辽阔又安宁的画面。

我想到被贬连州的刘禹锡，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去的是荒蛮之地，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是极好的地方。在此，他曾写诗给一个人，说：“往年访我到连州，无穷绝境终日游。”又写给另外一个人，说：“刺中若问连州事，唯有千山画不如。”

现在，我觉得自己、一个普通中学教师，正享受着一个唐朝刺史待遇：每天，穿行在连州的田野和大街小巷，连州的最高峰巾峰山从各个方向俯视着我。推开任何一扇窗，我都能看到远处的青山。在连州市中心，等待红绿灯的30秒时间里，一群金腰燕抓紧时间往马路中间盘旋，擦地而过，我很担心它们的胸羽沾上了尘土。红灯的最后7秒，一条小狗走着走着，居然卧在了斑马线上，开始一丝不苟地搔痒。我紧紧盯着它，很为它的安全担心。灯亮了，所有的车辆也都仿佛在担心这条狗，慢慢启动，小狗突然跳起，轻盈地走到了马路边上。燕子集体升高。我开着小电动车奔向连州图书馆。

我想，刘禹锡所说的“绝境”，应该跟我所见的类似，也曾经充满了10月的阳光。

一个朋友提醒我：连南有一个千年鸟道，北风刮起来的时候，在那里就有机会看到大群的鸟儿疾行迁徙——你一定要去看看啊。于是，我就顺着她的指引，到了连南的板洞省级自然保护区。

保护区在山上，上去需经过寨岗小镇。这是一个隐藏在深山里的瑶族小镇。我跟朋友在寨岗停留，顺道逛了寨岗的菜市场。在这里，我既看到了菜市场里都会有的肉、菜、水果，也看到一些有深山气息的物品：大堆的灰黑色腌菜，大罐的酸菜，生草药摊堆满了新鲜草叶子和根茎。最里面的一个角落，一个瑶族女人在摆摊卖烟草，干燥金黄的烟草叶子一张张堆叠着，散发着浑厚而有点呛人的气息。闻到那个味道，我感觉时间仿佛在这个角落停滞了。

走出来，看到一位老人家坐在小凳上，守着一大口袋圆绿的果子。那果子大小类似小苹果，是我从未见过的。我问老人，这是什么？他笑起来说：“山楂，这是山楂呀。”这个瑶族老人居然在说客家话，而这客家话的音调我如此熟悉。“这边山里长的，要浸酒、煲水才好吃。”他举起手说，“四文一斤。”

我心里一阵颤动。“四文”，发这两个音时，他从舌尖发出“细”音，而后唇齿闭合，又急速张开，发出“门”音——他发音的方式、音调，甚至整个句子的尾音，都跟我孩子父亲一模一样。

我在他面前蹲下来，一边挑选那些浑身斑驳的青色果子，一边用我半生不熟的客家话跟他交流。我渴望听他说出更多。孩子父亲去世已经4年了，他是粤西客家人。没有想到，在广东北境，这样一个山峦重叠之处，我居然听到了那熟稔的、仿佛一模一样的客家方言。

老人家骨节嶙峋的手柔弱地搭在膝盖上，笑着，样子慈祥又谦卑。他发声的气息甚至都与孩子爸爸绝似。我盯着他，他在用故人的语言说话。

我买了一袋山楂。拿一个咬了一口，酸涩味直冲天灵盖，涩极之后，甜润的感觉涌上来。

我没想到，我居然在这里跟故人相遇。我要看大群的候鸟迁徙，看铺天盖地的大鸟从我头顶绝尘而去，但没想到，在这样一个大山深处的小镇上，我居然遭遇了故人的语言。

“对哦，寨岗瑶族确实都说客家话哦。”保护区的廖科说。他翻着那些绿色的湿果子，说：“这些，我们这里确实也叫山楂，不过这是青皮山楂，这种山楂空口吃是不行的，太涩了，要炮制过才行。”

我查了一下，原来这种青色的山楂学名叫“台湾林檎”，是蔷薇科苹果属的常绿小乔木，中国南方山区的原生乡土物种。

入夜，我走到保护区高处。山风呼啸，从北方扑面而来。四周是高低低的山影，山顶极高处，有极遥远的冰晶一样的星星。站了一小会儿，就感觉寒意入骨。

在此地，两道东西向的山岭对峙，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山坳，这条山坳联通了湖南和广东，与湖南云冰山的南风坳一样，处在“东亚—澳大利西亚”鸟类迁徙路线上。今年，保护区候鸟环志站的目标任务是“监测候鸟2000只”，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任务了。

雾浓了。这样的天气，迁徙鸟类的导航系统受到干扰，容易低飞，它们看到灯光极容易落下来——今晚将会是一个忙碌的夜晚。

环志站刚打开两盏雪亮的灯，高空中就迫不及待地传来鹭的飞鸣。我抬起头，有大鸟在雾中盘旋、飞鸣。“是草鹭叫。”护林员赵师傅非常笃定。他是瑶族里的“过山瑶”，在环志站历练了两年，已经是非常老练的熟手了。草鹭盘旋几下，最终顺利地躲开了环志站灯光的诱惑，叫声越来越弱，终于消失。而这边，雪亮的灯光里，一只鸟正迎面飞落下来，盘旋两下，越来越低，还没等我看清它的落处，另外一只也扑棱着，直直落在灯下。

顿时，几位环志站工作人员忙碌了起来。办公室内，两位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忙碌地工作着：拍照、定名、登记信息、收集羽毛，按照它们的体形、体重，小心细致地给附跖扣上相应环志。廖科给我示范抓握中小型鸟类的手法：一只手食指和中指轻轻夹住鸟的头部，另一只手轻轻夹住鸟的下肢，使其爪部没有着力点。只见他轻柔地一捋，就把一只白喉斑秧鸡倒着放进了称重杯，小鸡一动不动，简直像被施了魔法。

红翅凤头鸢在工作人员手间挣扎着，它羽冠蓬松，全然没有了林间的潇洒俊逸。两只池鹭在待量的袋子里发出愤怒的咆哮。一只小小的矛斑蝗莺试图逃跑。来了一只虎纹豹，廖科反复叮嘱：“小心点，小心点！豹太凶了！”一只疲惫的红角鸮自己落在办公室门口，它的眼睛溜圆，惊讶地久久地看着这一切。

午夜12时，廖科说，走，我们把这一批放飞。他带着我们，在黑暗中仿佛走了许久，一直走到没有灯光干扰的地方。他打开袋子，把小鸟轻轻托在手上，略微举高，松开，等待，红胸田鸡猛地跃起，熟练地逃向一丛灌木。池鹭则略微有点笨拙、紧张，也仓皇地飞向了一棵大树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了廖科的这个举动，我略微有些悲伤。这动作如此郑重，仿佛一个仪式、一个祈祷。这些依赖基因记忆而匆匆前行的鸟儿，被这一片灯光诱惑，以至于长途旅行被打断，不知道它们未来的旅程还能否顺利。被打断的它们还能再次起飞并安全降落到目标地吗？

赵师傅说，小鸟很厉害的，他们曾经监测到一只草鹭，一个晚上就从这里飞到了柬埔寨！我反复核算速度和距离，不太相信草鹭能干出这种事——他有可能记错了时间。但他仍坚信这场史诗级别的迁徙无误，而这迁徙正在我头顶发生着。

四

鸟儿御风而行。这个夜晚，浓雾中传来一阵又一阵遑遑苍凉的鸣叫。这鸣叫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急迫，一种非此不可的焦虑。这是候鸟的使命，也是它们的规律和本能。它们在这漫长的迁徙和停留中成长、繁衍、死去。被短暂羁留、扣上环志的那一只，是从5000万只候鸟中被命运选中了的那一只。借着这环志，人类有可能一窥它的命运。

候鸟必须迁徙。时间必须从这个时节进入下一个时节。刘禹锡也必须离开京城，向连州进发。我和你，和故人，和那个卖山楂的老人，也必须都要在各自的轨道上前进。而那些鸟儿一样，我们似乎对此也一无所知。只知道朝着某个方向飞。因为浓雾和大风而悲鸣，因为那一盏明亮而温暖的灯，我们跟踉跄跄地停下来。

凌晨，廖科说，雾浓了，你们下山吧。于是，我们重新上车，告别了一屋子叽叽喳喳的鸭旅客，在浓雾中盘旋，再盘旋，下降，再下降，回到沉睡中的寨岗小镇，回到充满烟火味的中间。

过了两天，连州大降温，学生们都穿上了大棉袄。我发信息问环志站的赵师傅：“今晚你们那里鸟况如何？”他回复说：“风又大又冷，受不了。才两只。迁徙的高峰过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狡黠地补充了一句：“好好备课，把我们忘了吧。”我似乎已经看到他皱着眉头笑起来的样子了。

坎珂的内迁之路

当时由于火车通行不正常，时开时停，且拥挤不堪，人们都发疯似的往外逃，以至于从陆路运输机器设备已经完全不现实。而水运，因为黄浦江吴淞口已被日军封锁，长江航运不通，只能走内河太湖到镇江，再装上长江轮船驶往武汉。内河吃水浅，大轮船不能航行，仅靠木船载货，用小火轮拖运。如此所运的货物吨数有限，再加上上海的内迁工厂不少，需要运输的东西很多，一时间可供雇用的木船紧张起来。物以稀为贵，吴羹梅不得不花一笔不菲的费用才雇到一艘小火轮和三艘小木船。中铅员工们冒着生命危险，从中华学艺社里拉出打好包的机器设备运到沪西的码头，夜以继日装船。待机器设备全部装上船后，已经是10月底了，吴羹梅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立即下令开船，离上海越远越好。

木船用树枝茅草伪装起来，假如停着不动的话，从空中看下去，就像一块荒地。每只木船之间相隔半里地左右，这样既能避免暴露目标，又可前后照应。

途中若遇到敌机空袭，马上停泊在芦苇丛中。尽管厂里随船押运的职工一路小心谨慎，依旧危机四伏，翻船、被炸、丢失等突发事件实在难以预测。

考虑到整个工厂都将内迁，吴羹梅希望厂里全体职工尽可能随厂走。而由厂里培训的那批年轻人要求无条件内迁，其余成年男工可以自己决定去留，女工则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行。此次内迁，虽然厂里许诺抗战胜利后一定会回上海，但需要多长时间，到那时会不会发生变化，谁心里都没数。许多职工

心存疑虑。所以，真正随工厂内迁的职工仅三四十人，约有一半的职工留在了上海，有些甚至是技术工人。而内迁职工，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前，陆续离开了上海。

章伟士从常州返回上海后，与郭子春一起先行一步，于10月中旬赶往武汉，安排新厂筹建以及职工住宿等先期准备工作，以待机器设备和大批职工的到来。吴羹梅断后，等厂里搬迁工作收尾后，再撤离上海。不过这时日历翻到11月底了，上海变成“孤岛”后，去镇江的交通中断，吴羹梅只能取道香港，再由粤汉铁路转赴武汉。至于上海方面，由郭子春夫人丁瑞云（又名御厨春子）留守办事处，因为她是日本人，所以不怕日军来找麻烦。丁瑞云主要负责发放厂里随迁职工家属的生活费用。

考虑到中铅迁到内地后，生产铅笔所需要的原材料难以购买，所以吴羹梅到了香港，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在香港创办了协昌贸易公司。有了这样一个专做贸易的公司，中铅就可以通过协昌，买进所需原材料，由水路转运内地，免得铁路交通中断，影响生产。协昌公司

的股东主要有：一是吴羹梅留学日本时就相识的、时任驻日公使汪荣宝的儿子汪重熙。汪重熙曾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习化学专业。此番在港重逢，汪重熙投了6000元港币，并出任公司协理。二是吴羹梅的堂兄，曾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吴晋。吴晋投了3000元港币。三是吴羹梅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华侨林国珍、鲍籍灵，两人在香港日本洋行做买卖，共筹得近2万元港币。另外吴羹梅还通过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周叔廉，从银行借得3000元港币，并用这笔钱买了两辆卡车。

协昌贸易公司总办事处设在重庆，由章伟士担任总经理。香港设分处，由汪重熙负责。协昌公司自成立以来，曾两次由香港发货，分别运往武汉和重庆。

1939年在香港沦陷前，该公司的业务宣告结束，经营无盈利、无亏损。近2万元港币股本转入中铅和后来创办的光华油漆厂。

1937年10月26日，闸北失守，因苏州河一段水上运输线被日军截断，上海各厂抢运物资更加艰苦。到了12月10日，镇江运输站撤退，内迁工厂一事也随之叫停。在此期间，由上海迁至武汉的工厂达146家。这146家工厂发起成立的迁鄂工厂联合会，公举颜福秋、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。

中铅的机器设备约于11月中旬运到武汉，暂时封存在江边的仓库里。为了安顿内迁工厂，国民政府计划开辟武昌的龟山和蛇山地区作为工业园区。然而，由于各种设施和条件不到位，这一计划并不能立刻付诸实现。许多内迁工厂基于爱国热情，恨不得尽早复工生产，支援抗战，所以在1938年初就有36家内迁工厂因陋就简复工了。

中铅一来是为了抗战，二来是为了解决随厂内迁的职工和家属生活问题，也加入复工行列。机器设备刚一运到，章伟士等人便积极寻找临时厂房，筹备开工事宜。经过努力，租到汉口市中心方正里一幢空房子，又通过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的协助，解决了电力供应问题。1937年底，中铅正式复工。

吴羹梅是1937年12月才辗转来到武汉。他刚刚抵达时，厂里还在安装机器设备。因为临时性的，并未安装所有机器设备，仅仅安装了铅笔成品车间，把在上海已制作成半成品的白杆铅笔用油漆加工为成品，行销市场。

铅笔是生产出来了，但货款不能及时收回，虽然当时中铅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已经达到11万元法币，但厂里的流动资金仍然不足。幸亏吴羹梅在武汉碰到中学同学方长明，其时任汉口中南银行副经理。通过老同学，中铅从汉口中南银行贷到一笔款子，渡过了难关。不过就是这种临时性生产，中铅也未必能维持多久，很快中铅又踏上了西撤的征途。

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，安庆、九江也相继沦于敌手。武汉的局势越来越严重。

不声不响当个听众

宁白

断想

街市闲逛，观四方，常会有些场景让你会心一笑。

有个周末，坐地铁去市郊看望朋友，我知道离地铁站不远处有一所市重点高中的分校。走出地铁口，迎面看到学校附近一个香味飘散的香肠摊位，男摊主摆弄着香肠，不时地看一眼走近摊位的学生，笑眯眯的。

摊位前挂着一张纸，上面的三行红字把我逗乐了：“你考清华，他考北大，我烤香肠。”这是为了吸引那些高中学生的。我从中学出了摊主的聪慧。前两句是对这座重点高中学生的祝福，后一句是为了表达服务于那些才子才女的诚心，同时放低了自己的身段。烤香肠本是孩子喜欢的零食，再看看这位摊主的诚心示好，他们多半会来上一根。果然，几个学生咬着烤香肠、聊着天，开心地在摊头前走过。

幽默的自嘲，从来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外化。

又有一次，我去不远的街边菜市场闲逛。一个卖蔬菜的摊边，有一张两尺宽的纸上写着一行字：“天生我菜必有用。”摊主是一位架着眼镜的男青年，不像是摊主，他不张不开嘴吃吃喝喝，站在摊档后，笑盈盈地看着来回走动的大伯大妈。我好奇地问：“你是代你爸妈出摊吧？”他微微一笑说：“我爸这两天有事忙去了。”他大学毕业了，还没找到工

棉鞋里的三春晖

李动

岁月书

寒流突然而至，清晨我穿轻便的新式棉鞋时，蓦地想起小学四年级时穿过的那双黑色灯芯绒棉鞋。

那天上午，教室里老师讲课的声音，像冬日薄弱的阳光在空气中缓缓飘浮。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，我全部的知觉都由双脚而上被冻麻木了。我悄悄地跺脚，不敢出声，像一只被困住的小兽。

终于挨到放学回家，我把两脚塞在被窝里取暖。薄暮时分，母亲才下班回来，赶紧到厨房里张罗晚饭。煤球炉子刚生起来，火苗还怯怯的，我走到厨房门口，倚着门框，满腹委屈地说：“妈，我上课脚冷。”母亲转过身，走到煤球炉前，“啵”一声，利落地盖上炉门，将炉子闷熄了。她解下围裙，拉住我的手说：“走，妈带你到天山一条街买棉鞋去。”

外面的风比白日里更尖利，像磨快了了的刀子，往领口、袖口里钻。两里路一段不近的路程。母亲走得很快、很急。她紧握着我的手，仿佛要把身体里的热都传递给我。我发现她也穿着单布鞋，便问：“妈，你冷吗？”母亲坚定地说：“不冷。但我知道脚冷是什么滋味。那年你外公被日本人杀害后，外婆听说他们要追杀八路军家属，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连夜出逃，大冬天，我穿着单薄的鞋赶路，脚被冻伤了。”

天山一条街上的店铺，已亮起了稀稀疏疏的灯火。我们径直走进那家鞋店，玻璃柜台里正摆着几双棉鞋。我那时已有了审美意识，指着其中最贵的售价5元多的那双棉鞋说：“我要这双。”那双鞋是乌黑的那灯芯绒面，鞋面上鞋带交叉穿过，千层布的底子纳着密密的针迹，像整齐的芝麻点。

母亲蹲下身，替我脱掉旧鞋，将我的脚轻轻塞进那只毛茸茸的鞋里。一股暖流包裹住了我冰冷的双脚。那暖意如此实在，如此妥帖。

“合脚吗？”母亲仰起脸问我。店铺里昏黄的灯光落在她的脸上。

“合脚。”我用力地点头，声音里是满满的、几乎要溢出来的欢喜。母亲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双鞋，那时5元多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每个月六分之一的工资。

回去的路似乎短了许多。我穿着新棉鞋，脚下是前所未有的轻快与温暖，每一步都像踩在蓬松的云朵上。风还在吹，可它再也奈何不了我了。我甚至开始有闲心去看天上那颗颗冻得发抖的寒星。

最近的清晨也是这样冷。我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双棉鞋套在脚上，就在脚趾微微缩痛的刹那，那个遥远的黄昏，那一炉被毅然关掉的煤球上的火焰，那寒风中急促走过的两里路，竟不由分说地冲破几十年时光，重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的脚，在绒布棉鞋里渐渐暖了过来，而我的眼眶一阵温热。

学，学的是艺术管理专业。

我称赞他这行小字很吸引人，又蹲下，选了西红柿、土豆、洋葱，装进了一只他递给我的红色塑料袋。

临走时，我说：“你现在有空，想爸爸帮忙，以后工作了，累得都不给你爸说话了。”他快速反应，说：“那不会。”一脸真诚的表情。

这使我想到去过的一家咖啡馆。走进这家咖啡馆，迎面是一幅垂直的乳白色长布，上面用黑色大字写着“咖啡哪有上班苦”。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书写者好像为了写出自己的无奈而故意为之。我想，老板一定是年轻人，也一定是为了告诉上班族，本理解你的心情，请进来喝一杯。朋友说：“调侃似的吐槽蛮有趣味，让人感受到店主的善解人意，一走进去就觉得轻松。”于是，我们走进这家咖啡馆的小沙发里，吃了蛋糕，品尝一杯“有点苦”的咖啡。

街头幽默，是把烟火日子里的酸甜苦辣嚼碎后，含蓄风趣地向你传达对生活的感受，其中闪烁的智慧之光使街巷的氛围变得令人愉悦。

于是，我的目光从小店旁、桥头上，在一伙一伙聊天的老人身上停驻。这些普通劳动者多半见多识广、世事通达，快活不拘，将回忆往事说得洒脱幽默。我总会忍不住走近他们，不声不响当个听众……

扫码关注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扫码关注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扫码关注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扫码关注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扫码关注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扫码关注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扫码关注公众号，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解秋日报 连载广告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：021-22898598

“笔”路蓝缕

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话

徐鸣 著

心存疑虑。所以，真正随工厂内迁的职工仅三四十人，约有一半的职工留在了上海，有些甚至是技术工人。而内迁职工，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前，陆续离开了上海。

章伟士从常州返回上海后，与郭子春一起先行一步，于10月中旬赶往武汉，安排新厂筹建以及职工住宿等先期准备工作，以待机器设备和大批职工的到来。吴羹梅断后，等厂里搬迁工作收尾后，再撤离上海。不过这时日历翻到11月底了，上海变成“孤岛”后，去镇江的交通中断，吴羹梅只能取道香港，再由粤汉铁路转赴武汉。至于上海方面，由郭子春夫人丁瑞云（又名御厨春子）留守办事处，因为她是日本人，所以不怕日军来找麻烦。丁瑞云主要负责发放厂里随迁职工家属的生活费用。

考虑到中铅迁到内地后，生产铅笔所需要的原材料难以购买，所以吴羹梅到了香港，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在香港创办了协昌贸易公司。有了这样一个专做贸易的公司，中铅就可以通过协昌，买进所需原材料，由水路转运内地，免得铁路交通中断，影响生产。协昌公司的

随之叫停。在此期间，由上海迁至武汉的工厂达146家。这146家工厂发起成立的迁鄂工厂联合会，公举颜福秋、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。

中铅的机器设备约于11月中旬运到武汉，暂时封存在江边的仓库里。为了安顿内迁工厂，国民政府计划开辟武昌的龟山和蛇山地区作为工业园区。然而，由于各种设施和条件不到位，这一计划并不能立刻付诸实现。许多内迁工厂基于爱国热情，恨不得尽早复工生产，支援抗战，所以在1938年初就有36家内迁工厂因陋就简复工了。

中铅一来是为了抗战，二来是为了解决随厂内迁的职工和家属生活问题，也加入复工行列。机器设备刚一运到，章伟士等人便积极寻找临时厂房，筹备开工事宜。经过努力，租到汉口市中心方正里一幢空房子，又通过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的协助，解决了电力供应问题。1937年底，中铅正式复工。

吴羹梅是1937年12月才辗转来到武汉。他刚刚抵达时，厂里还在安装机器设备。因为临时性的，并未安装所有机器设备，仅仅安装了铅笔成品车间，把在上海已制作成半成品的白杆铅笔用油漆加工为成品，行销市场。

铅笔是生产出来了，但货款不能及时收回，虽然当时中铅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已经达到11万元法币，但厂里的流动资金仍然不足。幸亏吴羹梅在武汉碰到中学同学方长明，其时任汉口中南银行副经理。通过老同学，中铅从汉口中南银行贷到一笔款子，渡过了难关。不过就是这种临时性生产，中铅也未必能维持多久，很快中铅又踏上了西撤的征途。

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，安庆、九江也相继沦于敌手。武汉的局势越来越严重。

(十四) 连载